

张斌峰 张晓光 主编

殷海光 学术思想研究

——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辽宁大学出版社

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

——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斌峰 张晓光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张斌峰, 张晓光编.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5

ISBN 7-5610-3978-6

I. 殷… II. ①张…②张… III. 殷海光 (1919~1969) 逻辑学 - 思想评论 - 文集 IV. B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231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辽宁大学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80 千字 印张: 16

印数: 1-15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琢石

责任校对: 李 佳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代序)	林毓生(1)
殷海光与新儒家	韦政通(9)
追述殷海光先生与评价殷海光思想	成中英(15)
藏风聚气	
——怀念殷海光老师	张尚德(22)
徐复观与殷海光	李明辉(25)
“五四之子”与“五四”精神	张斌峰(57)
“容忍”与“自由”的关系	
——略评“胡适与殷海光之论争”	黄展骐(80)
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	张建军(86)
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观	李翔海(93)
论殷海光的科学观	曾昭式(107)
殷海光对自由的辨误与廓清	张晓光(113)
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海耶克与 殷海光之间	张斌峰(118)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徐友渔(127)
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 看法	钱永祥(138)
我们离社会正义还有多远?	
——在自由与平等砝码的两极	张宝明(151)
自由、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比较性视角	
——以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三人 为例的考察	王中江(161)

殷海光的历史哲学论述之反思·····	廖仁义(179)
呐喊与孤独	
——殷海光先生悲剧的浅析·····	颜昌武(193)
一蓑烟雨任平生	
——解读殷海光先生的科学理性精神与 道德人格修为·····	王青鹏(200)
殷海光与张尚德·····	何劲(206)
殷海光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启示(节录)·····	陈曼娜(212)
论“失落”	
——关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王静(222)
殷海光的国民党观剖析·····	杨宁芳(229)
殷海光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引入及其 引发意义·····	关兴丽(234)
殷海光与墨子论思想标准比较·····	王讚源(242)
林毓生科学方法和逻辑观试探·····	郭桥(253)
殷海光、黄展骥	
——兼评黄的“谬误、悖论研究”·····	王建芳(263)
顾准、殷海光二先生民主观之比较·····	张世保(272)
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的形成·····	王新生(281)
海耶克论自由与法治·····	石元康(286)
道义悖论初探·····	陈锐(312)
真性模态与道义模态·····	周禎祥(321)

附 录

实用逻辑六题

——衣帛、中道、仁智、民主、渐进、自由·····	黄展骥(330)
“无为、人民、银两、宁鸣”析谬	
——“谬误”与“社会”·····	黄展骥(347)

- 香港的“殖民教育”点滴！
 ——百年“已树人”！一年“树新人”？…… 黄展骥(359)
- 香港社会文化点滴
 ——“稿匠”的自由…… 黄展骥(367)
- 文学、仓卒、逻辑、含混
 ——略评石人先生的《疵求》…… 黄展骥(381)
- 不要“讳疾忌医”
 ——以“坏逻辑”为准？…… 黄展骥(387)
- 囫囵吞枣
 ——略谈“填鸭教育”…… 黄展骥(389)
- 文人相轻
 ——幸勿以讥弹视之…… 黄展骥(392)
- 连鸡蛋也要挑骨头！
 ——“包涵”也有坏的一面…… 黄展骥(395)
- 趣谈“中庸”
 ——“中庸”与“极致”…… 黄展骥(398)
- 略论《中庸》
 ——是“适中至当”，还是“平凡庸碌”？…… 黄展骥(413)
- 真金不怕红炉火
 ——推介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 黄展骥(434)
- 剖析“自由世界”的谬误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黄展骥(439)
- “经济自由”与“自由经济”辨析
 ——理想与政策…… 黄展骥(444)
- “外在自由”的逻辑分析
 ——免于人为强制、免于自然障碍、
 自身能力…… 黄展骥(452)
- “自由”的定义、事实、态度
 ——评张佛泉笔下的三大“自由派”…… 黄展骥(460)

西方“自由”词义析谬

——评介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 黄展骥(466)

海耶克的《自由与诸自由》辨谬

——能力、财富、强制、政治…………… 黄展骥(472)

日常语言学派风味的逻辑分析

——评黄展骥的“悖论研究”…………… 桂起权(493)

评黄展骥的“谬误与逻辑杂论”…………… 刘粤生 雷念曾(498)

出版后记…………… (502)

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

(代序)

林毓生

先师殷海光先生是在 1969 年 9 月 16 日以癌症不治逝世的。我远在海外，到 9 月 20 日夜里才知道这个噩耗。当时内心整个为悲痛与愤慨所占据——无论就对人生的热望，对学术的真诚，对理想的坚持来说，殷先生都不该在五十之年就匆匆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年多以来，每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促膝谈心，再也接不到他的论学感怀的长信，内心深处便不由地觉得无比的空虚与悲哀。像殷先生这样的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再找到了！

我个人深切感念在他逝世前的十几年中，他给我的无数督促与鼓励。但本文的目的，却不仅是为了表示个人的私衷。殷先生一生基于纯真理想的奋斗，所带给他的横逆与痛苦，足使天下有良心的人同声一哭。而他生命中所追求的，所持之不移的，是他一生奋斗的过程，实具有永恒的意义。下面所写的，是我个人对他一生奋斗之意义的一些看法。

要评论一个人，必须先了解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殷先生自己常说他是“五四后期人物”。这句话包含了无限的感慨，同时也是对他自己和他所处的时代之深切写照。殷先生的一生奋斗的意义，我觉得，应该从他所以成为“五四后期人物”，与成为“五四后期人物”后的精神企向与痛苦来了解。

殷先生既是“五四后期人物”，他的思想与风格自然仍表现着五四精神，只是殷先生的五四精神的内在发展与外在遭遇都有“后期”的征象。五四时代是一个浪漫的启蒙时代。所谓浪漫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基本动力来自情感的激越，充沛的情感跃动支持着单简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信息正是迟疑、困惑，及对每件问题繁复性之冷静的观审的反面。（当时知识青年有不少从某一主义跳到另一主义的现象。但这不代表迟疑与困惑。他们每次对每种主义做了选择以后，不求深解，便开始服膺传播这种主义的现象，正反映着激越的情感与单简的信心在他们内心的势力。）所谓启蒙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从理性的观点出发，自己主动地要求掌握历史巨轮的运转。这个浪漫的启蒙运动，内部蕴涵着很大的矛盾。但此种矛盾在五四的高潮时期很不明显。浪漫的激越与理性的启蒙，当时好像相互为用，相得益彰。

具体而言，五四精神最强烈的一面是对中国的过去全面而彻底的否定。（虽然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多多少少有反传统思想的产生；像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激烈到毫无保留、全面反抗的程度——却是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稀有的现象。）传统既不可依恃，也不可改进；激烈的反传统思想遂导向“全盘西化”的企求。在许多五四知识分子的眼里，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髓；于是，科学与民主便成了西化运动的焦点。除了最后几年，殷先生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以外，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与他一生言行的目标，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传统中的许多缺陷之揭发，尤其对科学与民主之阐释，往往远超过早期五四人物的言论。说他是五四思想集大成的殿军实不为过。

殷先生诞生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他自然赶不上参加五四运动。但西南联大却有五四的遗风，他在青年时代朝夕浸润在那种风气之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许多五四时代为科学、自

由、民主奋斗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因为许多其他因缘，并未很鲜明地显示出来，然而，这些思想却是他在1949年到台以后，着手重振五四精神的主要因素。但西南联大学生很多，他们的思想也颇不一致，为什么在这批学生当中，殷先生能特别坚毅地站在五四为科学、为自由的立场为中国奋斗呢？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拿“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这句话来解答的。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与强烈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溶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在少年时代就已使他对家庭中理学式的虚伪，感到极度的不安与反感。这种不安与反感，配合当时的少年风气，在情感上已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极端的厌恶，同时也导使他对西洋文化产生很大的仰慕。这种心理后来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接触，再加上他在西南联大的业师，是一位极为英国化的研究逻辑、经验论与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学人；透过这位学人，他所看到的西洋文化自然是以科学、民主与自由为代表的。

殷先生以一人之力对之做悲剧性的重建，其成绩不可谓不大。他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伟业，除了得力于他清新的健笔，据我看来，最主要的是由于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这种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与民主而呼吁。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只有自由的民主制度最能满足道德的要求；也只有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比较最能维护个人尊严的制度。而自由与民主的建立，则必须靠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的观念的养成。换句话说，自由与民主，必须建筑在个人的尊严上。任何谈论自由民主的人，如不拿殷先生在分析海耶克的自由思想的长文中所提出的把“人当人”的结论作为言行的前提，终究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反自由民主之实。殷先生在逝世前的二十年中，以无比的道德勇气，不避横逆，挺身而出，为自由民主呼吁的千秋之业，在中国与世界争自由争

人格的历史上都是不朽的！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先生肯定了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是人的最基本价值——有了个人自由才能有个人尊严。可是，在文化层面，要自由的价值与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殷先生——除了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以外——却和许多早期五四人物一样，认为应从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与提倡科学方法做起。事实上，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面的攻击，主要导源于他对中国传统中许多克害个人尊严的思想与制度的道德的忿怒。他提倡科学方法，实际上，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他道德热情的要求。1967年12月23日我给他的信上，曾有下面一段对于他多年来提倡科学方法的意见：

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表示出您是具有 *intense moral passion* 和 *poetical inspiration* 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 *confirm* 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colorless thinking*。究其原因，实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 *tool*，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 *moral passion* 的道路。However, *moral passion*, 和科学方法的溶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 *tension* (if not *contradiction*)。这种 *tension* 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 *burden*。

殷先生回信甚为称许，并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

殷先生既提倡科学，自然注重纯理知识。追求纯理知识的欲望，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这种表现，实是五四内在精

神发展的后期征象之一。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大家喊口号，随声附和；启蒙的理知追求，是被浪漫的情感激越所掩盖着的。然浪潮过后，启蒙的理知成分，终究不能被情感的激越所代替。殷先生对科学、自由、民主的性质、功用、目的的纯理了解，都下过很大的功夫，用过很多的心力。这种知识的追求与渴望，更可由他购置大批有关书籍的热情上看起来。殷先生有关当代逻辑、分析哲学、自由、民主、社会学理论的藏书，大概比当时台湾任何公私立图书馆都完备，以台湾大学教授清苦的待遇，而能有如此丰富的藏书（大部分是自己购置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学生寄赠的），这件事实的背后，蕴藏着对知识追求的炽热渴望。但殷先生的一生，在他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重大的原创贡献；这是他晚年提到的遗憾之一。一些追悼他的文字中，有的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其实，照笔者的看法，这正是殷先生道德成就甚难（几乎不可能）避免的一面。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无所谓遗憾的。（道德与学问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如谄媚权贵的来布尼兹【Leibniz】——可能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我们不能因之以为他不是一个人。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即道德”的“知识”是指如何完成道德人格的“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知识，也不是科学知识。）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于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并不损人利己，但想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均能暂时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的。如此专心致志，积年

累月，也许有重大学术成就的希望。殷先生虽然谈起学问来有时冷峻高迈，实际上，他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苦难的中国。

殷先生这种敏锐的道德不安与纯理的知识渴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可从他之所以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看出来。他在他的夫人的帮助下，以数年之力，亲手一砖一铲地把台大配给他们堆满垃圾的宿舍，改建成有山有水的小花园。表面上他似要建筑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以便在其中潜心研究学问。事实上，他之特别努力建筑这个小庭院，除了由于他的爱美与厌恶凡俗的性格以外，我觉得，正强烈显示着他不能与世隔绝而偏要锻炼“隔离的智慧”的心境。（相反的，倒有许多终日混在嘈杂的市声中，不须强把自己封锁在家园中，竟成为对外界视而不见与之隔绝的人。）

逻辑与分析哲学的研究是须要在极端冷静的心情下钻研的。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的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

正如殷先生之提倡科学方法和对知识的追求深受他的道德热情所影响，他在文化层面，另一继承五四精神的强烈表征——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也主要是由于道德热情所驱使。但五四式的反传统思想，虽然表面上是由许多当时颇能使人信服的理论根据所支持，然而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某些点面的深切厌恶，而理知上，不能从中国传统一元论的有机思想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因此，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点面的厌恶，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整体的否定。但中国

传统甚为复杂，仅以在传统中形成正面价值系统的儒家思想来说，从古典时期的孔孟思想到宋明理学，其中变化很大，而在宋明理学中又有许多派别可分，并不是在没有深切了解之前，可以随便评论的。况且，（包括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系统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模式与制度的）社会系统之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化约关系，虽然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传统中许多令人厌恶的行为模式与制度，并不完全是传统的思想与价值造成的；而传统的思想与价值，也不完全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或经济生产方式造成的。固然，开倒车式的复古与自由、民主、科学不能相容；硬说中国传统中有现代西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亦足以丧失许多传统成分的本身价值。但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礼”的观念，是与汉代以后，受阴阳五行与帝国统治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一套“仁”必须在当时特定的“礼”的形式中完成的思想，颇不一致的。这两种思想蕴涵着很大的冲突。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礼”之道德自主性的观念，虽然与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础——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观念——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交融的。因此，要实现自由与民主，今后中国有识之士，不应再拾那五四时期（主要因不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有机思想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所造成的）对中国传统全面否定的牙慧，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办法，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看，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国泥土上成长，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失落者。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

殷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他生命中最后几年有重大的改变。这是激烈的五四反传统思想后期的光荣发展；同时也象征着五四时代趋近结束，一个继承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而不受五四反传统思想所围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个重大改变，在殷先生是来之不易的。像他那样具有尖锐道德热情的人，冲力很

大，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个以道德力量为基础的思想家，以他对思想工作严肃而真诚的态度，一旦发现自己从前思想的缺陷，无论陷入多深，都是可以拉回来，再朝自己所认为对的新方向努力的。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改变，可以看到他的道德感与理智力相互融会的崇高境界。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的作开始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综观殷先生一生奋斗的过程，精神的痛苦与思想的演变，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纯真道德热情肯定了精神的实有。在五卅时代的高潮时期，大家赶时髦，当时做一个“五四人物”并不难，像梁巨川（济）先生那样反抗五四潮流的人物，却是由坚强的精神力量支持着的，但当许多早期五四人物纷纷萎缩干枯，或卖身求荣之时，在外界客观环境剧变之后，殷先生能在种种横逆之中，以一人之力使五四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继续延续几十年，那就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了。当我们了解他所代表的五四后期的时代意义以后，我们也就了解他生命中所显示的，超时代的永恒意义。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及身达成，似乎不是最要紧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恒不朽的。因为殷先生一生为自由、正义、真理的奋斗，实源于人性中最高贵的成分，只要人性本身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便也是永恒的；至于世间的成败，都是不相干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殷先生在乎世间的成败，他也不会对自己的理想那样坚定不移了。

人类的历史，可说是一部光明与黑暗相互消长的纪录。黑暗虽然不会因光明的出现而完全绝迹；丧失良心的人虽然也不会因殷先生的奋斗而有所感动；但殷先生给予人类精神实有的见证，却使良心未泯的人们得到一种真切的精神鼓舞！

作者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

殷海光与新儒家

韦政通

—

1969年，殷海光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的悼念文，文中有《海光与新儒家》一小节，略略指出他如何由原先对新儒家的反动，最后终于跳脱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的自省。1983年，我写《两种心态，一个目标——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的检讨》一长文，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在思想不同的路向上各自的表现，及其在当代思想史上代表的意义。文中的“自由主义”所指，虽不以殷海光为限，但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台湾，他显然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

殷氏生前在难中比较接近的友人、夏道平先生逝世后，在台湾我恐怕已是仅存的一位了，自然义不容辞。经一再斟酌，我想趁这个机会谈一下他与新儒家两位重要人物：徐复观、牟宗三之间交往的经过，以及在这过程中又为何造成矛盾和对立。

二

根据徐复观先生《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一文，他是在一九四四年的重庆，湖北同乡夏声先生（后来成为海光的岳父）家，与海光初次相识，所得印象是觉得他语言简练有力，且有相当的学养。这一年，海光三十四岁，年少气盛，能写一手好文章，徐先生因激赏他的文章，曾向蒋介石推荐，晋见以后，没有下文。抗战胜利，两人相继复原到南京，海光终因徐氏向有关人士大力说项，得进中央日报当主笔，其时海光虽不是国民党员，但与徐氏都是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两人都到了台湾。徐复观从此与现实政治逐渐疏离，并决心在文化思想方面尽点心力，于是创办了《民主评论》半月刊（在香港出版，主要销售台湾），初期，殷海光仍是该刊的基本作者。同年（1949）末，以胡适先生为发行人，实际负责人为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从此海光成为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在五十年代的台湾，这是两本文化思想上水准最高的刊物，《民主评论》渐成为弘扬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的论坛，而《自由中国》则是海外自由主义的重镇。前者酝酿了今日广为海内外所知的“当代新儒家”；后者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海光到台湾后，很快便脱离中央日报。1949年8月起，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学术上，他的立足点是逻辑分析与英美经验主义。他的中年思想，可以用“逻辑”与“经验”这两个范畴来概括，也是他宣扬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工具。而当时复兴儒学的主要人物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的理论骨架系得自西方观念论中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这就使得这两个阵营不可避免地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对垒。再加上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承继了“五四”以来自由主义反传统这一特色，终导致它